

人类文明史

5

16世纪至18世纪

总主编 彼得·伯克

副主编 王培建

袁光敏

王 明

傅高义·世英

王 明·世英

王 明·世英

王 明·世英



商务印书馆



人类文明史

History of Humanity

5

16世纪至18世纪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主 编	彼得·伯克	哈利勒·伊纳尔哲克
副主编	I. 哈比卜	J. 基—泽尔博
	草光俊雄	C. 马丁内斯·肖
	E. 切尔尼亚克	E. 特拉布尔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文明史. 第5卷, 16世纪至18世纪/(英)伯克等编著; 中文版编译委员会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 6

书名原文: History of Humanity: Volume V
ISBN 978-7-5447-5094-3

I. ①人… II. ①伯…②中… III. ①世界史-文化史-16世纪~18世纪 IV.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6431号

Original Title: History of Humanity, Vol. V: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itors: P. Burke and H. Inalcik; Co-editors: I. Habib, J. Ki-Zerbo, T. Kusamitsu, C. Martinez Shaw, E. Tchernjak and E. Trabulse)

First publish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7, place de Fontenoy, 75 352 Paris 07 SP, France, and Routledge, 11 New Fetter Lane, London EC4P 4EE, United Kingdom.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7, place de Fontenoy, 75 352 Paris 07 SP, France, and Yilin Press, 15-16th floors, Building A, 1 Hunan Road, Nanj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UNESCO 1999

© UNESCO and Yilin Press 2014 (Chinese Edition)

© Yilin Press 2014, for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UNESCO and Yilin Press.

The designations employed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material throughout this publication do not imply the expression of any opinion whatsoever on the part of UNESCO concer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any country, territory, city or area or of its authorities, or the delimitation of its frontiers or boundaries.

The author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choice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facts contained in this book and for the opinions expressed therein, which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UNESCO and do not commit the Organization. The present translation has been prepared un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Yilin Press.

ISBN Yilin Press 978-7-5447-5094-3

ISBN UNESCO 978-92-3-502814-0

若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译林出版社的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手段复制本书的任何内容。

本书使用的称呼及材料,若涉及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政府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其边界及疆界的划分,不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点。

对本书包含的材料的选择和表达,及其表达的观点,均由作者负责。这些观点未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点,教科文组织对其不承担任何责任。

中文译本由译林出版社负责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1-24号

书 名	人类文明史,第5卷:16世纪至18世纪
编 著 者	彼得·伯克等
译 者	中文版编译委员会
责任编辑	田宏碧 韩继坤
原文出版	UNESCO and Routledge, 199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16
印 张	31.5
字 数	1 101 千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5094-3
定 价	400.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中文版编译委员会

总主编

钱乘旦

主 编（依姓氏笔画排名）

王加丰 王 玮 刘北成 阮岳湘
肖 宪 杨令侠 张森根 郭华榕
陶笑虹 曹中屏 彭 刚 舒运国

本卷译者（依姓氏笔画排名）

王小军 王 静 毛 倩 叶星星
庄万友 刘 军 阮岳湘 刘春兰
孙晨旭 李 丹 李 阳 庞冠群
郭存海 顾 杭 陶笑虹 曹中屏
赖国栋

目 录

总序	1	伊凡·哈比卜	
费德里科·马约尔		6.2 欧洲人在美洲	56
前言	3	安东尼·帕格顿	
夏尔·莫拉泽		6.3 欧洲人在非洲	60
概述	8	让·布莱格	
乔治—亨利·迪蒙		6.4 欧洲人在亚洲	63
国际委员会	10	6.4.1 欧洲人在西亚	63
各卷编者	11	哈利勒·伊纳尔哲克	
图表目录	12	6.4.2 欧洲人在亚洲其他区域	65
地图目录	13	萨维帕里·戈帕尔	
图片目录	14	7 宗教与世界观	67
本卷作者名录	17	尼尼安·斯马特	
致谢	20	8 自然和宇宙的研究	75
		史蒂文·J. 哈里斯	
综述	1	9 社会研究	87
彼得·伯克 哈利勒·伊纳尔哲克		戴维·伍顿	
主题篇	7	10 艺术	99
1 人口与环境	9	帕萨·米特	
雅克·迪帕基耶		11 信息与交流	107
2 技术发展	21	彼得·伯克	
伊凡·哈比卜		地区篇	115
3 经济和社会变革	26	12 西欧	117
伊凡·哈比卜		12.1 经济与社会	117
4 政治转型	38	12.1.1 16 和 17 世纪的经济与社会	117
约翰·A. 霍尔		安赫尔·加西亚·桑斯	
5 文化接触与交流	45	12.1.2 18 世纪的经济与社会	128
古莱尔莫·塞斯特培德斯·德尔·卡斯蒂略		卡洛斯·马丁内斯·肖	
6 殖民主义	55	12.2 政治与国家	140
6.1 导言	55	12.2.1 16 和 17 世纪的政治与国家	140

	安赫尔·罗德里格斯·桑切斯		18.2.1 亚美尼亚	250
12.2.2	18 世纪的政治生活	147	帕洛威尔·M. 莫拉迪安	
	卡洛斯·马丁内斯·肖		18.2.2 格鲁吉亚	253
12.3	文化	158	阿卡基·苏格拉兹(已故)	
	马努埃尔·费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		19 中亚	255
13	中东欧	173	伽里纳·A. 普卡琴科娃	
	安东尼·毛察克		20 南亚	259
14	俄罗斯	181	20.1 印度	259
	维克托·I. 布加诺夫		伊凡·哈比卜	
15	东南欧	192	20.2 斯里兰卡	281
15.1	巴尔干地区的社会结构	192	莱斯利·古纳瓦德纳	
	尼古拉·托多罗夫		20.3 尼泊尔	284
15.2	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	195	伊凡·哈比卜	
	帕斯卡利斯·M. 基特罗米利德斯 纳迪		21 东南亚	286
	亚·达尼奥娃 亚历山大·杜楚 马诺利		德尼·龙巴尔(已故)	
	斯·夏齐斯达克伊斯 亚历山大·波波维奇		22 中国	296
	统筹: 尼古拉·托多罗夫		22.1 明朝和清朝	296
16	奥斯曼帝国	200	王思治	
16.1	历史	200	22.2 西藏地区	316
	哈利勒·伊纳尔哲克		安玛莉·布隆铎	
16.2	科学	209	23 日本和朝鲜	320
	塞维姆·特克里		23.1 日本	320
16.3	艺术	211	速水融	
	古努尔·奥尼		23.2 朝鲜	332
17	阿拉伯诸国	214	李泰镇	
17.1	叙利亚	214	24 北美洲	339
	阿卜杜勒—卡里姆·拉菲克		杰克·P. 格林	
17.2	伊拉克	218	25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	346
	萨亚尔·K. 贾米勒		25.1 拉丁美洲	346
17.3	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埃及(1517—1798)	221	25.1.1 墨西哥	346
	阿卜杜勒拉希姆·阿卜杜勒拉赫曼		西尔维奥·萨瓦拉	
17.4	北非	229	编辑整理: 彼得·伯克	
	阿布德杰里勒·特米米		25.1.2 秘鲁	354
17.5	阿拉伯半岛	233	富兰克林·佩斯·加西亚—伊	
	穆罕默德·赛义德—夏阿非		里戈延	
18	伊朗、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	240	25.1.3 巴西	360
18.1	伊朗	240	劳拉·德·梅洛—索萨	
18.1.1	伊朗(1501—1629)	240	25.2 加勒比海地区	368
	罗杰·M. 萨沃里		帕特里克·E. 布赖恩	
18.1.2	伊朗(1629—1796)	246	26 非洲	376
	约翰·R. 佩里		26.1 经济与社会	376
18.2	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	250	阿比奥拉·菲利克斯·伊洛科	

26.2 政治结构与趋向	385	哈里斯·梅梅尔—福蒂	
阿比奥敦·阿德巴约·阿德迪兰 伊西		27 大洋洲	412
多·恩达威尔·额·恩泽姆 布鲁达·		克里·R. 豪	
A. 伊坦达拉 霍伊尼·H. K. 比拉			
统筹: 艾萨克·阿德格堡·阿金卓宾		大事年表	420
埃利斯·索姆尼		索引	446
26.3 文化	403	图片	

综 述

综 述

彼得·伯克 哈利勒·伊纳尔哲克

本卷讲述的是所谓“近代初期”，即16—18世纪从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到法国大革命结束。将世界史划分为不同时期，具有现实必要性，对类似本项目的多卷本而言尤其如此。然而这些划分并非自然形成，乃人力所为，是史学家强加于过去的结果。这些划分通常存在疑问，只适用于某些趋势和某些地方。1492—1789年这一时期亦不例外。

在西欧，传统上认为“中世纪”结束于1500年前后，“近代”由此开始。这一观点源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发明了“中世纪”一词，来描述介于罗马衰落与他们自身所处时代之间的、他们所认为的“黑暗”时期。到18世纪，近代这一概念已根深蒂固，然而有关近代的起源仍存在异议。一些史学家认为近代开始于1453年，即君士坦丁堡沦陷的这一年，依据是希腊学者逃到意大利，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另一些史学家则主张近代始于1492年。在这一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同时基督徒征服了摩尔人王国格拉纳达（这一胜利弥补了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当时欧洲人的悲痛心理，让他们欢欣鼓舞）。而一些政治史学家，从贝纳多·卢彻莱（约1500年）到利奥波德·冯·兰克，更支持将1494年作为近代的开端。这一年法国入侵意大利，接着欧洲爆发了一系列战争。新教徒则认定近代开端为1517年，这一年马丁·路德用拉丁文写成著名的《九十五条》，钉在维滕贝格教堂的大门上，标志着宗教改革的开始。许多知识分子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来定义其所处的新时代，认为这一时期的优越性建基于三大新发明，即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些发明使发现新大陆成为可能。而其他人，如法国贵族米歇尔·德·蒙田则更通晓史实，指出中国早在“一千年”前就已发明了印刷术和火药（现在我们知道，当时的中国人同样能使用磁罗盘）。

法国大革命被普遍认为是新时代的开端（无论新时代是好是坏）。正是这一事件将“革命”（传统意义指“回归到”原来的某种状态）重新定义为不可逆转的重大变革（尽管也有人相信存在“反革命”的可能性）。革命者引入了一种新历法，视1792年为“元年”。但在集体记忆中，具有象征性的年份应为1789年。倘若将1789年确定为近代世界的发轫，那么我们需要重新审视1492年的重要性。因此出现了“近代初期”这一表述，以描述“中世纪”结束至法国大革命或后革命时代之间的三百年，而

这一表述显然自相矛盾。

从20世纪末回顾这一时期，我们如何进行判断？有史实能够很好地证实这一时期始于1453年而非1492年。15世纪后半叶，穆斯林入侵基督教世界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开始，因为奥斯曼帝国是与欧洲直接相邻的，能利用欧洲武器在中东欧、地中海和印度洋地区进行扩张的唯一非欧洲政权。在经济史上，1453年也是一大转折点，这一年预示了热那亚在近东贸易的结束，迫使热那亚人向西发展，进入西班牙和美洲。

从欧洲史的角度来看，如果将1492年和1789年的事件视为更多渐进过程的标志，这两年便意义非凡，值得一提。但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将这两年作为划分标准却不太适当。

至于美洲，难以否认1492年对经济社会史及政治文化史的重要性。同时，甄选一个日期作为这一时期结束的标志更为困难。较合理的是，将1776年或1810年（分别为北美和南美独立运动的开端）作为分界线，这比1789年更为恰当。当然，在法国发生的事件毫无疑问对美洲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在海地和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见第26.1.3章）。

在非洲和亚洲（尤其是东亚），争议更大。以非洲为例，1492年前后确实标志着一个转折。西班牙人开始开采墨西哥和秘鲁煤矿后，非洲在世界经济史上的重要性降低。如D. T. 尼亚奈所说，墨西哥和秘鲁的煤矿“优于布雷、班布克、尼各拉姆和莫诺莫塔帕的煤矿”。1491年，刚果统治者以阿方索之名接受洗礼，这象征着欧洲对非洲越来越多的文化渗透。尽管欧洲对非洲的殖民进程缓慢而不激烈，但起始时间可定为1500年左右。

即使如此，有些非洲史学家仍然认为1600年前后比1500年前后更具有代表性。他们将17和18世纪视为一个独立时期，在此期间经济史和政治史发生了重大变革。此次变革的诱因之一在于西方武器的引入，从而使那些对新技术感兴趣的统治者有能力统治他人。同时对非洲历史而言——对美洲历史也是如此——另一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奴隶的出口。在这一时期，约1000万非洲人被迫横渡大西洋，在新大陆沦为奴隶。由此，也有人主张18世纪末奴隶贸易的衰落成为第五卷的终止时间。

在印度洋地区，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到达卡利卡特标志着欧洲渗透的开始。这与哥伦布发现美洲一样具有重大意

义。事实上,K. M. 帕尼卡尔在其经典之作《亚洲与西方霸制》中,将 1498—1945 年的四个半世纪描述为“亚洲史上的瓦斯科·达·伽马时代”。三大帝国(亦称为“火药帝国”)——奥斯曼、萨非和莫卧儿——兴起的时间也与本卷所划定的时间开端相符。根据塞弗里的观点(见第 18.1.1 章)，“从多方面而言,1501 年萨非王朝的建立是伊朗历史的分水岭”。在印度,莫卧儿王朝建立于 1526 年,此时奥斯曼统治者苏莱曼一世(自 16 世纪 20 年代开始统治)被公认为是最伟大的苏丹。至少就印度而言,18 世纪晚期是一大转折点。1757 年的普拉西战役后,殖民统治开始进入第一阶段。

如果从世界主要地区来看,1492—1789 年对东亚来说最无关紧要,这样的划分就显得有点欧洲中心了。在东亚,大的分水岭事件无疑出现在“近代初期”的中期。在中国,17 世纪的混乱状态导致 1644 年清朝取代明朝。与 15 世纪或 18 世纪的相关年份比较,这是更为重要的转折点(当然,“17 世纪中期危机”在欧洲、奥斯曼帝国和印度莫卧儿帝国同样存在)。此外,另一划分标准是:18 世纪末也可被视为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标志为 1793 年英国提出贸易要求、1795 年乾隆皇帝的六十年统治结束以及 1796 年白莲教起义。如后文所述(见第 22 章),这次起义被称为“清王朝的没落点”。然而,1793 年英国的贸易请求遭到拒绝。直到 1840—1842 年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才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日本历经数十年内战后得来的和平,以及 1600 年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取得胜利后政治体系的改变,比 17 或 18 世纪内发生的任何事件更具意义。下一个重要转折点发生于 19 世纪,或者以 1852 年美国佩里准将及其“黑船”抵达日本,或者以 1868 年帝国“复辟”(其意义远远超过“革命”)作为分水岭。

假如我们按地区对世界史进行划分,则很难达成统一标准。然而倘若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标准的划分是更为容易还是无法实现呢?

欧洲哲学泰斗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曾经反对书写世界历史或我们过去常说的“普世史”。他认为,书写普世史尽管具有现实必要性,却是不可为的。必要性在于历史的不同时期只有与整体联系起来才具有意义,而如果不给历史(不同于个体和群体)设立一个目标,那么书写普世史是不可能的。如此看来,中世纪基督教年代史编撰者可以编写普世史,因为他们认为历史由上帝缔造。同理,相信天意的维柯和相信“理性的狡计”的黑格尔以及马克思可以编写普世史。信奉欧洲教化使命的欧洲史学家可以编写,甚至马克斯·韦伯也可以尝试,因为他研究印度和中国的目的就是要确定西方的优越性及其所谓的“合理性”。在其他历史编纂传统中,包括古希腊(如波利比奥斯)、伊斯兰(如伊本·赫勒敦)和中国(如司马迁),历史进程被视为循环前进而非线性发展,但表现出明显的模式感。在对这些宏大理论提出质疑的当代史学家看来,无论来自世界何处,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寻找一根主线,将各种历史串连起来,构成一个整体。

在某些情况下,这条主线表现为“现代性”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官僚主义、世俗化和“科学革命”等相关联。这些术语代表了对人类历史至关重要的一系列相关变革。研究世界不同地区的中央集权,或者研究人们对“新科学”的不同反应,如阿姆斯特丹、罗马、莫斯科、伊斯坦布尔或北京如何对待哥白尼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问题在于,“现代性”几乎不可能有一个满意的界定。在西方文化中,“现代”这一术语自 12 世纪起就几乎被持续地使用了,其涵义也逐渐发生变化。在过去的约半个世纪里,史学家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前几个世纪对“现代”的探求,甚至在欧洲历史中,都造成了不合时宜的判断,同时导致了这样的悖论:我们更难解释“我们的”世界最终是如何形成的。对于将西方现代性观点强加在世界其他地区历史之上,反对之声则始终是强烈的,在此勿需详言。

如果将“西方的崛起”作为本卷的主线,效果也许更佳。我们可以探究,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而言,欧洲这一复杂的传统社会(或者说欧洲的某些地区)是否、在何种程度上、如何以及为何能够在这一时期内实现技术、经济、军事、政治或文化上的“领先”,以及这种“领先”如何转变为支配。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著述可被视为这一方面的经典之作。布罗代尔首先论证地中海地区、东西方、穆斯林和基督徒在 16 世纪末共同享有的经济生活,继而揭示一些在欧洲、印度和中国出现的重要趋势,如 16 世纪的人口增加,最后对西方资本主义兴起进行描述,并以此作为他对“物质生活”研究的结束。

沃勒斯坦将布罗代尔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依赖理论家的观点相结合,讨论了 16 世纪欧洲经济“世界体系”的崛起。该体系具有一个“核心”(欧洲西北部)、一个“半边缘”(地中海地区)和一个“边缘”(欧洲东部及西班牙语美洲地区)。他表示,商业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崛起与东欧的农奴制、西班牙语美洲及巴西的奴隶制的兴起之间存在一定关系。换言之,在世界遥遥相隔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这种依赖性的表现形式之一为:在墨西哥和秘鲁开采出来的白银,通过塞维利亚港运至欧洲。其中一些美洲白银通过奥斯曼帝国抵达印度洋。同时,还有些白银通过航行于阿卡普尔科和马尼拉之间的西班牙大帆船,从美洲直接运至东亚。

这种世界经济并非史无前例。最近,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指出,早在 13 世纪末就存在一种“世界体系”(与 16 世纪出现的一样,主要是奢侈品贸易)。然而,由于蒙古人入侵和 1348 年在西亚和欧洲爆发的黑死病,这一体系已经支离破碎。

1492—1789 年,欧洲人率先将糖作物引入美洲,由黑人奴隶种植。这段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正不断加强。同时,他们还从西亚引进咖啡,从东亚引进茶叶。这些都有助于改变欧洲的社会生活方式,而且不局限于上层社会,到 18 世纪也影响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

W. H. 麦克尼尔提出了另一种主线。他指出,世界不同地区

各种文化之间的接触一直是世界历史的主题。这些接触自地理大发现后变得越来越频繁。至少在西方,这同时也是印刷时代,它使得许多人——包括法国作家蒙田,我们在前文引用过他对中国的见解——能够远距离地对异域文化有一些了解。

然而,有些人竭尽所能使自己融入其他文化。如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以明朝官吏的形象出现在中国民众面前;英国“叛徒”萨姆森·洛里投靠土耳其,服务于高级海军上将乌卢阿·哈桑(见图1);还有史学家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其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印加人,其《秘鲁史》利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编纂方法来展示印加的文明成果。在以上例子中,这些人不仅掌握了另一文化的信息,而且还吸纳了它的思维模式。我们可以引用人类学家所称的“文化适应”对此进行解释。文化适应并非1492年才出现的现象——在中世纪时期的西班牙,犹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就发生了文化互动——但它随着自愿(如英国人或西班牙人移民美洲)或非自愿(如非洲奴隶)移民,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

对文化适应的进程下一个不偏不倚的结论非常困难。由于它常与征服、压迫和剥削联系在一起,我们应该对之加以谴责吗?还是因为它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方式,丰富了文化,我们应该对之加以颂扬?或者因为它给我们造成了精神压力和认同问题,我们应该为之忧虑?无论何种反应,我们都有必要认识到这一进程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因为它普遍存在于中国的穆斯林、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徒以及许多混合族群的身上,新大陆更甚。

在近代初期发生的文化遭遇中,美洲土著与欧洲人之间的冲突最为显著、激烈,由此产生的后果也最为重要。

文化遭遇一开始必然会有相当大的地区差异,但很快就发展为征服与殖民化。显而易见的是,1492年后,美洲北部、中部和南部的历史由于各地不同的传统和自然环境而产生了差异。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墨西哥、秘鲁是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剩余产品足以满足城市精英的需求;而美洲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土著则以小规模的流动部落为单位,靠打猎、采集或刀耕火种为生。

其次,美洲不同地区在发展程度或者说“发展轨道”上的差异,显然是带有各自历史传统的欧洲人,如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等,征服、殖民不同地区的结果。传教士和移民中有些是天主教徒,有些是新教徒。有些人来自相对集权、独裁统治的国家,有些人(尤其是荷兰人)来自政权分散的国家。新大陆的经济活动甚至也因文化传统差异而不同。以巴西为例,甘蔗种植业沿袭了早期葡萄牙属地如卡纳里斯的模式。帝国政策的不同也为美洲人带来了重大的文化影响。如西班牙人在其殖民地建立了大学和出版社,而葡萄牙人却没有这么做。

只有在如此规模上将各种差异纳入考虑,我们才能够对美洲做一个有价值的比较分析。比如,我们也许会考虑美洲“被征服者的态度”,当欧洲人在新大陆竭力传播其思想及价值观时美

洲土著的各种反应——有的选择接受,有的进行融合,有的则消极抵抗或公开叛乱。也许我们还可以像阿尔弗雷德·克劳士比一样,来研究所谓“哥伦布交换”的后果,即把欧洲的植物(小麦、葡萄和橄榄)、动物(马、猪和牛)引入美洲,同时也将美洲的植物(玉米、马铃薯、树薯等)带到欧洲和非洲。再者,我们可以检视宗主国与殖民地、中心与边缘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所造成的文化影响。我们将发现:新大陆的不同地区几乎同时出现了独立的殖民认同。此外还值得研究的是,在巴西、古巴和海地等地,一种特征鲜明的非裔美洲文化开始形成——欧洲天主教与西非宗教崇拜的不稳定结合。

这里谈及的文化是指广义上的文化,包括艺术、文学和科学,也包括大众和精英的看法与价值观,借由手工艺品、表演、日常生活以及经典的音乐和建筑作品等体现出来。糖史在本卷中也占有一定篇幅,因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消费模式正是其价值观和文化的体现。要理解文化在长期内所发生的变化,则需要将这些变化放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因此,本卷相当于法国人所称的人类“整体历史”,即尝试揭示人类所有主要活动之间的联系。

5

贯穿本卷的还有一些统领性主题,其中两个需特别指出。第一大主题是中心和边缘的关系(须强调的是,“中心”指的是多个中心)。本卷论述最多的是西欧各中心,原因在于里斯本、马德里、阿姆斯特丹、巴黎和伦敦都曾是海上帝国的中心(罗马是精神帝国的中心)。然而,我们也将讨论伊斯兰教从其中心麦加向东南欧、东南亚甚至中国传播的过程(如后文第22章所示,《古兰经》正是在这一时期被译成中文)。

文化扩散的另一重要例证是波斯学术及文学传入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正如15世纪在意大利复苏的古罗马文化被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宫廷所采纳,继承于古伊朗、发展于哈里发国家的一种高雅文化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奥斯曼、莫卧儿及萨非帝国所接纳。如同意大利画家在法国和西班牙受欢迎,波斯细密画家在伊斯坦布尔和德里的需求量很大。诸如《卡布斯教海录》《政府书》(前者描述了理想绅士的言行举止;后者记载了完美君主的行为准则)等作品代表了这种高雅文化的精髓,并广为传播。

文化中心和边缘这一主题引发了许多问题。例如: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普遍一致吗?这一时期,北京、伊斯坦布尔或巴黎等城市文化影响是否独立于政治影响?那些文化影响和政治力量极不相称的城市,如佛罗伦萨、京都等,情况又如何?至少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尽管地方精英常常将大都市视为自己的文化典范或样本,并在一定延迟(通常为三十年)后追随为时尚,但地方文化不能被描述为中心文化的苍白映射。有时候,边疆地区反而能诞生出一种替代中心的文化,如奥斯曼帝国士兵和苦行僧的通俗文化。

无论如何,中心向边缘的文化渗透并非像油浮水面一般自动传播。甚至可以说,欧洲向亚洲的商业开拓应当被视为渗

透,而非(如帕尼卡尔所称的)“强加”。它通过利用当地和西方资本来强化当地的商业化趋势,而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贸易。如果缺少这种当地趋势和外来力量之间的“适配”,资本主义的崛起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更为普遍的是,正如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研究夏威夷和库克船长的到来所表明的那样,假如我们不能重构某些方式,借此每种文化中的个体能够感知、利用其他文化,那么文化交往的历史是很难理解的。

人类学家所称的“文化适应”(或“文化互化”,强调相互影响)不能等同于对文化元素的简单借用。例如,尽管奥斯曼人从欧洲借用了诸多元素,但他们并未被欧洲文化同化,原因在于奥斯曼人同其他一些亚洲民族一样,通过伊斯兰教保留着自己的价值体系。正如布罗代尔曾指出的,不仅有必要研究技术和观念的传播,而且有必要研究“抵制”传播的行为。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奥斯曼人和火器的实例来加以说明。14世纪末15世纪初,奥斯曼人开始使用大炮、手铳,如火绳枪。最初他们雇用外国专家,接着他们学会了自制火器的技术(事实上,奥斯曼专家在邻国供不应求)。正如穆斯林法学家所说,利用“异教徒”发明的理由是“有必要使用敌人的武器”。因此,奥斯曼帝国是第一个从欧洲人手里学会现代技术的非欧洲国家。

采用这种方式借用军事技术,并未导致文化适应的进一步普及。奥斯曼人借用的是具体的技术,而不是不断改进技术的文化传统。因此,他们数次惨败于西方人之手。战败激励了他们更广泛地借鉴西方,以实现教育现代化(18世纪创立了一所军事工程学校),以及1839年后政府管理的现代化。

这一实例表明,解读文化史需要社会学和地理学的维度。有些文化似乎比较抵制创新,而其他文化则善于接受创新。为何会这样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有必要更近距离地观察在既定文化背景下不同社会群体的态度和价值观,尤其是精英文化(旧与新、世俗与宗教、军事与平民)和大众(即所谓“从属阶级”)文化之间的关联。在这几百年里,世界各地的精英阶层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大众文化?大众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文化适应”的压力?大众在多大程度上抵制这些压力,或出于自身目的接受精英文化的要素?反向而言,从大众“向上”延伸至精英的文化流量又有多大?

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有些出现在本卷的地区篇,而有些放在主题篇。由于缺乏比较,本卷可能仅为描述性研究,而非分析性研究。况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各种文化进行系统比较,将引发不少棘手问题。如果效仿马克思和韦伯的做法,从西方的角度评定其他文化,衡量它们的差异以及西方要素的缺乏(如理性、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等),这样做相对容易些,但同样不具有启发

意义,更遑论种族中心主义的嫌疑了。

假如试着超脱这种比较,我们将马上面临一个问题,即研究中所运用的各种概念工具均来自西方。正如从世界范围来研究“封建主义”所显示的一样,我们在这项研究中很难避免循环性,即先用欧洲术语来界定研究现象,然后“发现”它们在本质上属于欧洲。即使是一些明显无害、非特指的术语如“大学”“小说”,甚至“艺术”等,我们在创造它们时,也是以欧洲历史为蓝本。这样随之而来的危险是,比较变成了企图强迫伊斯兰制度或中国文本来适应西方模式。然而,我们要么使用这些西方工具,要么完全拒绝比较,除此之外似乎没有第三种方法,至少在目前如此。在进行比较的同时,保持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警惕,这样做无疑会稍好一点。

总而言之,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撰的其他卷一样,本卷试图给予世界各个地方应有的关注,广纳各种声音和观点。本卷力图在西方崛起这个单一情节和关于世界不同地方的篇章之间实现一种均衡,后者虽强调多样性,但付出的代价是缺乏统一的6主题。本卷强调广义上的文化,围绕“文化”史展开,不仅考察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散播,而且还关注由此引发的不同反应——从文化适应或同化到融合,再到各种不同的抵制行为(如17世纪初日本有名的闭关锁国政策)。相比对1492—1789时期的传统观点,本卷所讲述的历史——或更好地说,是我们能够聆听到的对话——更为复杂,因为前者仅将这一段历史视为现代性的发轫、资本主义的兴起或西方的崛起。

(阮岳湘译)

参考文献

- ABU-LUGHOD, J. 1989.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1250-1350*. New York.
- BAYLY, C. A. 1983. *Rulers, Townsmen and Bazaars*. Cambridge.
- BRAUDEL, F. 1979.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que et capitalisme*, Paris. English trans., 1981-2,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3 vols. London.
- CROSBY, A. W. 1972.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 FAGE, J. D.; OLIVER, R. (eds). 197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4 c.1600-c.1790*. Cambridge.
- GADAMER, H.-G. 1960. *Truth and Method*. (English trans., 1975. London.)
- MCNEILL, W. H. 1963. *The Rise of the West*. New York.
- NIANE, D. T. (ed.). 1984. *Africa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Paris.
- PANIKKAR, K. M. 1953.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London.
- PARRY, V. J.; YAPP, M. E. 1975. *War,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 SAHLINS, M. 1985. *Islands of History*. Chicago.
- SPATE, O. 1979. *The Spanish Lake*. Minneapolis.
- WALLERSTEIN, I. 1974. *The Modern World-System*. New York.
- WEBER, M. 1904-5.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English trans., 1930. London.)
- WOLF, E. 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7

主题篇

1 人口与环境

雅克·迪帕基耶

1500 年的世界

我们对 1500 年世界的人口结构没有太多的了解。

当时,仅有少数几个欧洲国家开始对出生、婚姻以及死亡状况进行登记。1232 年意大利里米尼地区的一份婚姻登记可能是现存最古老的人口登记簿。这样的登记簿在 14 世纪的意大利发现了大约 10 本,15 世纪欧洲的其他地区约有 50 本。

从古代起,为了税收和军事目的,就开始进行人口调查。但是罗马帝国的衰亡使得这一制度在西欧中止。随着近代国家的出现,各国在人口统计方面曾有过一些不太充分的尝试(统计内容包括家庭人口、土地、牲畜以及封建权利),但除了《末日审判书》(英国,1086)、《法兰西王国的教区和家庭清册》(1328)以及《1427—1430 年佛罗伦萨土地清册》之外,这类统计结果均未保存至今。

在中国,明朝(1368—1644)的皇帝恢复了人口调查的古老传统。首先挨家挨户进行人口统计,记录每个家庭成员的工作情况和家庭组织结构。随后,官方据此拟定出一份包含人口、货物以及税收在内的统计清单(即著名的“黄册”)。

在秘鲁,印加帝国的君主借助“魁普斯”妥善统计了人口和财产。所谓“魁普斯”是由不同颜色(颜色依统计对象性质而不同)的绳子扎成的捆,在几个不同的高度打结:代表个位的在最下边,紧接着上边是十位,然后是百位,依此类推。

现代研究者提供的有关 15 世纪人口的数字出自一些谨慎或者不太谨慎的推测。这些推测有的建立在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有的是依据人口居住面积所做的估计。根据不同经济生产形式——狩猎、畜牧、粗放的农耕、稻米种植等,研究者使用了不同的推算系数。

人口统计的某些要素相对容易得知,比如死亡和婚姻状况,因为这些要素虽在变化但十分缓慢,加之 16,17 与 18 世纪的统计数据和“政治算术家”(首批人口统计学家)有关欧洲的一些统计,都使我们有可能为过往人口发展的动态提出一些合理的假说。极其多样的家庭结构和婚姻习俗显然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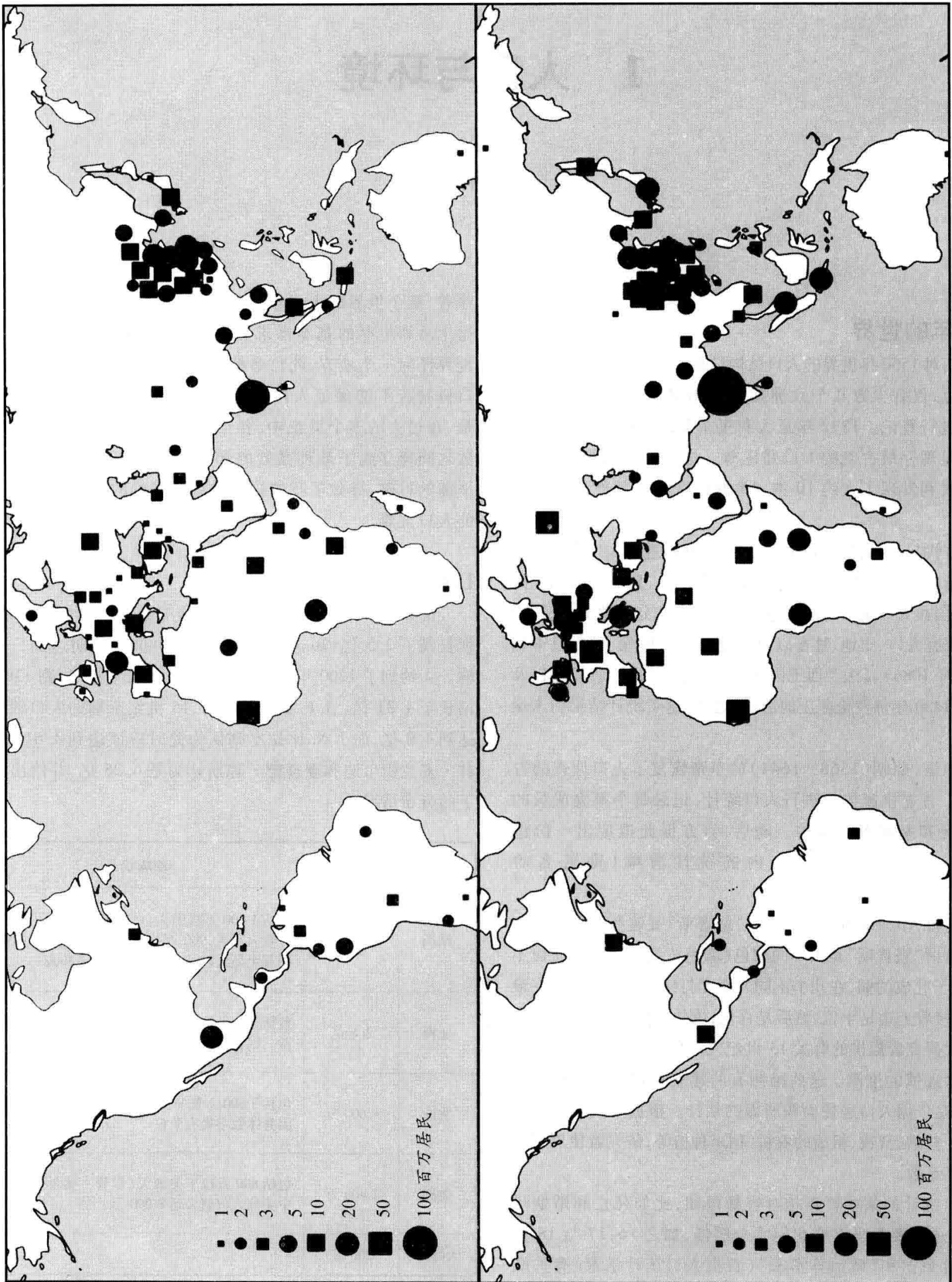
味着,整个世界的人类学地图是一幅色彩丰富的马赛克,但是生活和生存的基本需求为实际的可能性设置了限度: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死亡率都非常高,以至于说到底,任何人口机制若不能保证人口的再生产,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于是,在过去的多个世纪中,各个民族都在死亡人数和出生人数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微妙的平衡。正是航海大发现对这种平衡的打破,导致了我们将要提到的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人口灾难。

1500 年世界人口分布

世界人口(见地图 1)在“新石器革命”时代大约从 500 万增长到了 2.5 亿(Biraben, 1979),在中世纪初期达到一个高峰。大约到了 1200 年,全球人口可能增长至 4 亿,到 1300 年增长至 4.31 亿。J. P. 杜兰德认为,15 世纪末期的人口数量已达到 4.9 亿,而 J. N. 比拉本则认为此时应该达到 4.61 亿;科林·麦克伊韦迪和理查德·琼斯认为是 4.25 亿,并给出了如下的分布情况:

大洲	总人口	组成状况
欧洲	8 100 万	包括 1 500 万法国人,1 200 万俄罗斯人,1 000 万意大利人,900 万德国人,不足 200 万的伊比利亚半岛人以及 500 万不列颠诸岛人
亚洲	2.8 亿	包括 1.1 亿中国人,包含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国在内的 1 亿印度人
非洲	4 600 万	包括 3 800 万黑非洲人,这一统计仍存有疑问,因具体数字尚有争议
美洲	1 400 万	包括 800 万拉丁美洲人(尽管一些学者认为仅中美洲人口就多达 8 000 万)
大洋洲	200 万	

图表 1 1500 年前后各大洲人口(C. MacEvedy and R. Jones, 1978)。



地图1(上) 1500年世界人口(after J. Dupâquier)。 地图2(下) 1800年世界人口(after J. Dupâquier)。